

2024年,淄博大剧院推出“文艺党课”系列,《长征组歌》《红色娘子军》等经典作品相继上演,近千名党员干部参与。两年后,山东理工大学一场《歌声里的中国》艺术党课同样引发关注——教授主讲,260余名师生到场,讲解、演唱、互动、合唱穿插进行。两场活动相隔两年,落点都在淄博,共同回应了高校思政教育中一个老问题:学生身处课堂,情感参与不深,价值内化不足,教育效果往往停留在“知道了”而不是“认同了”。思政课要真正走进学生心里,不能只靠知识传递,还需要在情感层面建立连接。

淄博的实践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精准抓住了红色音乐这一具体切入口。一部红色音乐作品能够打动人心,绝不只是因为旋律悦耳或是歌词动人,它更能帮人们铭记一段历史、唤起一份情感、凝聚一种认同——在聆听的过程中,历史不再遥远缥缈,价值也不再抽象空泛。

沂蒙精神是山东红色文化的根脉所在,淄博的探索正是这一精神在具体地域的延伸。二者并非并列关系,而是源与流的关系。《黑铁山起义歌》创作于1937年,由时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

## 让红色音乐成为思政课的“声”动教材

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王靖涵

军第五军政委姚仲明作词,歌词中写道:“噢!我们的队伍发源在黑铁山西,红旗飘扬在山顶上……”一句歌词对应一段史实,一段旋律承载一份情感,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不再只是书本上的铅字,更成为至今仍能被大众感知的精神资源。用音乐承载历史记忆,本身就与淄博推进“文化淄博”建设的方向高度契合。

思政课应把这些红色音乐资源真正用活。一个方向是让档案“走出来”。淄博市档案馆联合教育部门开展了“档案+思政”的探索,通过展览、短视频等形式让档案走入公众视野。这一思路同样可以延伸到音乐领域:将《黑铁山起义歌》,以及1965年由淄博市革委文化局编印的《革命歌曲选》等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数字化保存,制作成教学资源包,标注清楚适用课程与教学建议,让老师拿到就可以直接使用,真正解决“有资源不会用”的问题。另

一个方向是让课堂“活起来”。如今,不少高校的红色音乐教育仍停留在“放一首歌、讲一段话”的阶段,只有零散活动,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山东理工大学打造的《歌声里的中国》艺术党课,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样本:先讲解历史背景,再进行现场演出,接着邀请听众分享感悟,最后组织集体合唱。这种“讲、唱、演、悟”结合的方式,为红色音乐教育的课程化建设提供了清晰思路。

2023年,淄博市提出“服务淄博、诚信淄博、志愿淄博、劳动淄博、文化淄博”城市建设目标。目前,当地在红色音乐育人领域的探索仍停留在个案层面,要实现常态化运转,还需要从三个方向发力。一是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以驻淄高校和相关文博机构为依托,系统整理淄博红色音乐文献,搭建数字化平台,把分散在各处的资料汇总归集,打造可开放共享的教

学资源库,推动省内高校之间实现资源互通,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二是推进课程化建设,总结山东理工大学“讲、唱、演、悟”的实践经验,将其纳入高校思政课程体系,推动红色音乐教育从单次活动升级为常态化课程,真正在日常教学中扎下根,成为思政课可反复使用的教学模块。三是深化校地协同,推动驻淄高校与淄博本地红色场馆、档案馆建立长期合作,让红色音乐教育从课堂延伸到实地现场,拓展教学空间;同时,建立师生参与地方红色音乐资源整理的制度化渠道,实现高校智力资源与地方文化资源的双向流动。

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思政课怎样才能真正入脑入心?淄博的探索表明,地方红色音乐资源从来不是尘封的档案,而是可以被持续激活的教育活水。在山东深入推进“文化两创”的背景下,让红色音乐成为思政课的有效载体,绝不只是在课堂上播放几首歌那么简单,而是要依托音乐激活历史记忆,让价值传递更贴合人的认知习惯——这既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也是对思政育人方式的创新。

##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道德如何“承续”

——评冯丕红《道德承续研究》

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辜丽娜

围绕“道德承续”这一核心概念,作者构建了一套彼此支撑的概念体系,其中“道德生态”的引入最具方法论启发性。作者将道德置于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中加以审视。“道德生态”概念的提出提醒我们:对道德伦理遗产的取舍,不应由政治、经济或其他任何单一力量独断专行,而应取决于“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平行四边形合力”。这一观点既忠实继承了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阐述,也为当前多元价值冲突背景下进行道德抉择提供了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道德基因”与“道德堕距”两个概念则分别从内在结构与外部动因两个维度,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体系。作者借鉴文化基因理论,将道德传统中保持连续性的基本单元称为道德基因,并区分为“道德生物基因”——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与“道德文化基因”——社会组织与运行的基本公理。前者具有普遍性,后者因具体情境而异,这一区分澄清了哪些道德要素能够跨越时代得以延续、哪些又需要在特

定语境中进行调适与转化。“道德堕距”则深刻揭示了道德承续在社会转型期被重点关注的深层原因:当道德观念的演变未能跟上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要素的变革步伐,便极易引发生态失衡与社会失序,进而促使人们回溯传统伦理资源以弥补时代发展落差。从这个角度看,道德承续实质上是道德生态遭遇时代压力、出现发展失衡时,开展自我调适、自我修复、自我革新的内在运行机制。

在理论资源的运用上,本书展现了跨文化对话的学术视野,使西方理论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新的阐释空间。麦金太尔《追寻美德》中关于“传统的合理性论证”的论述,以及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对传统延续机制的阐发,构成了全书核心的西方理论脉络。然而,作者并未机械套用这些理论,而是致力于让它们与中国本土的伦理思想传统展开实质性对话——无论是孔子“因革损益”“温故知新”的方法论、冯友兰的“抽象继承”说,还是梁启超“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接续观,乃至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的综合创新思路,都被恰当地吸纳并

融合进“道德承续”的理论建构之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麦金太尔的借鉴并非亦步亦趋:麦金太尔认为传统遭遇“认识论危机”后需要借助外部资源进行重构,本书则创新性聚焦“实践危机”——传统道德的失效不仅是知识认知层面的偏差,更是大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价值失据、无所依凭的存在性困境。通过这一关键理论转向,道德承续的研究重心从抽象知识论层面,下沉到了更具体、更鲜活、更坚实的现实生活世界。

总体而言,《道德承续研究》以二十余万字的完整篇幅,系统性完成了从原创概念提出、理论体系构建到研究方法落地的全链条学术探索。它既是对伦理学基础理论的深度深耕与创新拓展,也是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精准学术回应。正如该书序言所深刻提示的,提出一个全新学术概念本身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而人文思想的突破升级,往往始于核心概念的迭代更新。作者冯丕红不仅大胆创设,精准界定了“道德承续”这一核心概念,更围绕其搭建出逻辑自洽、层次清晰、富有强大现实阐释力的完整理论框架。在这一全新理论框架下,传统道德不再是束缚发展的沉重包袱,也不仅仅是陈列在典籍展馆中的静态文化遗产,而是一条奔流不息、与时俱进的精神长河——当代社会能够审慎汲取传统养分、立足时代创新发展,实现中华传统道德文明的创造性接续与创新性转化。

## 《论语》中仁与礼的关系探析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晨曦

再者,仁是礼的调适原则。孔子讨论三代之礼,格外重视“因”与“损益”,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表明礼本身就内含着自我更新的要求,礼制若僵化不变,便难以回应生生不息的伦理实践需求。而礼制损益取舍的准则,最终要归于仁道:离开了仁,礼的变易可能流于随意;秉持仁道,礼的调适便始终指向人伦教化的根本目标。仁为礼的变革提供了方向与尺度,让礼在历史流变中既不陷入僵滞,又不会丧失其本源。

二、礼为仁之用

仁虽是礼之本,却非悬空之德。它必须借礼而显、由礼而成,礼是仁从内到外、从个体到群体、从暂时到恒常的实现之路。

礼使仁从内在德性走向客观形态。仁心若仅存于内,便只是一种幽微难明的道德感受,既无从把握,也无从检验。孔子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又具体指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必须经由礼,才能从模糊的内在德性转化为视听言动中的外在规范。礼为仁提供了可感知、可遵循的客观形式,使不可见的德性变得可见,“为仁由己”的道德自觉由此便有了落实之处。

案,使礼从徒具躯壳的仪式回归仁的内在精神。

仁礼合一旨在弥合道德实践的内外割裂。春秋之时,礼仅仅被视作外在的行为约束,而仁则被视为内在的德性自觉。孔子将二者贯通为一,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是向内的省察,复礼是向外的归依,二者统一于“仁”这一目标。由此,礼不再是对人的外在规约,而是主体成就仁德的自觉途径;仁也不再是悬于形上的心性空论,而是循礼而为的修养工夫。仁礼合一为个体的道德修养提供了内外交养、本末兼举的完整路径。

仁礼合一旨在重建礼崩乐坏之后的天下秩序。礼崩乐坏的本质不仅是仪节的废弛,更是礼所维系的人伦秩序的坍塌。孔子以仁礼合一为重建秩序的枢纽:仁提供人心的共同归向,使秩序建立在内在认同而非外在强制之上;礼提供行为的规范架构,使秩序具有可操作、可传承的具体形式。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这个“和”正是仁心贯通于礼制之后所达成的秩序状态,既有差等之序,又无对抗之伤。仁礼合一由此成为孔子治世构想的核心,个体成德与天下安定在此归于统一。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仁与礼在《论语》中并非各自独立的范畴,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仁为礼注入生命,礼为仁开辟道路,二者的辩证统一既是孔子对春秋礼乐文明的深刻反思,也为后世儒学奠定了思想根基。这一结构的确立,使个体成德与天下安定得以贯通,仁礼之学由此成为儒家思想中历久弥新的核心命题。

《论语》中仁与礼的关系,历来是儒学诠释的核心议题。仁指向内在的德性自觉,礼表现为外在的行为规范,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内外二分,而是相互依存、彼此成就的关系。唯有从体用一如的视角出发,方能真正把握孔子仁礼学说的深层义理。

一、仁为礼之本

礼并非一套自足的制度条文,其合法性源于仁的奠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仁之于礼具有本源性地位。

首先,仁是礼的发生根源。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点明仁心最初萌发于血缘亲情中,由孝悌自然生发的行为正是礼的最初形态。孔子论孝,以“不敬,何以别乎”将赡养行为提升至“敬”的精神层面,表明孝礼的本质不仅在于奉养的形式,更在于内在的敬意;论丧礼,以“与其易也,宁戚”表明丧礼的本质不仅在于仪节的周备,更在于内心真实的哀戚。可见,礼的本源不是外在规范的设定,而是仁在伦理情境中的自然生发。

其次,仁是礼的价值内核。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句话揭示出,礼的实质不在于外在的形式器物,而在于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倘若没有仁贯注其中,玉帛钟鼓不过是简单的器物陈列,礼也只会沦为空洞的虚文。孔子又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心,礼乐对他而言不过是空洞的仪式,更无法成为成就德行的通道。因此,礼的意义不在仪节本身,而在于仁心的灌注。